

1977年，當日本九州北部都市福岡興建地鐵時，在日本鐵路JR博多站西北方向發掘出了數以萬計的陶瓷碎片。經鑒定，這些碎片大部分為十二至十三世紀的中國製品。這一大批出土的歷史文物恰好將福岡與和它隔海相望的中國東南沿海聯結起來。福岡與中國的交往歷史跨越千年，並在福岡這座城市四處留下有形與無形的痕跡——從別具一格的博多拉麵，到福岡城下的鴻臚館遺跡，再到大量承載着過往的海外貿易與生活訊息的瓷片。福岡在過去的十數世紀接納過無數出於各種目的渡海而來的人，見證了日本官方對於外來者管理措施的變化，而長期與海外文化的交流互動也使得福岡呈現出獨具魅力的城市風貌。

## 一、鴻臚館與大宰府

福岡作為對外交流窗口的歷史可以上溯到筑紫館與鴻臚館時期。「筑紫館」一詞在平安時代前、公元688年就已見於史籍，而進入平安時代後，被改稱為更具中國風的「鴻臚館」。筑紫館最初主要用於接待來自唐朝與新羅的使節，而日本遣使出訪時也會讓使節在筑紫館停留，做出使準備、等待合適的風向。進入九世紀後，從唐與新羅來日本的使節基本中斷，而鴻臚館的功能也發生改變，以接待來自中國的客商為主，成為了一處海外交易據點。<sup>1</sup>

鴻臚館從公元七世紀至十一世紀，存續約四百年左右。早在1920年代，日本的考古學家中山平次郎就根據有關鴻臚館的詩作中對於景色與地形的描寫，判斷鴻臚館的遺址應位於福岡城附近。而半個多世紀之後，在1987年平和台棒球場改造時，果真在中山平次郎推斷的位置發掘出了鴻臚館遺跡。該遺址經過

---

1 大庭康時：《中世日本最大の貿易都市——博多遺跡群》（東京：新泉社，2009），頁12-14。

系統發掘，現在已是可供訪客參觀的鴻臚館跡展示館，館內保留了部分原始遺跡，同時也展示發掘出的各種物品，包括日本與中國及朝鮮半島的交易品等。根據現在的遺址，我們可知鴻臚館坐落在面向博多灣的高地上。在九世紀中叶入住鴻臚館的中國唐代客商曾留下「鴻臚門樓掩海生，四鄰觀望散人情」的詩句。<sup>2</sup>如今，經過千餘年的自然變遷、泥沙堆積，以及步入近代以來的人工填海，福岡博多灣的海岸線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現在站在鴻臚館故址雖然已望不到海，但周圍濃厚的歷史氛圍感依然足以讓人體味數個世紀前的行旅人的心境。

鴻臚館雖然是接待外國訪客的迎賓館，但它其實也是日本朝廷對外管理制度中的重要一環。外國訪客在九州登陸日本後應入住鴻臚館，且不得擅自離開館區範圍行動。管理九州地區事務以及日本對外事務的機構大宰府位於鴻臚館東南方向約 16 公里處。鴻臚館近海，而大宰府處於相對內陸的地區，這一選址大

2 石曉軍：〈日本園城寺（三井寺）藏唐人詩文尺牘校證〉，《唐研究》第 8 卷（2002），頁 114。

概也有安全與防禦角度的考慮。當海外客商抵達日本後，來自大宰府的官員會詢問他們的來航理由、人員組成及貨物情況，而他們隨船攜帶的貨物，都會被官員暫時扣留、檢查。大宰府會把調查後的人員名單及貨品清單呈交給京都朝廷，由京都朝廷決定對來訪客商如何處置，是將他們安置在鴻臚館、進行後續貨品交易，還是要求他們即刻返航。同時，京都朝廷具有海外貨品的先買權，即這些貨物會在京都朝廷挑選要留取哪些物品後，才可以發還給客商，進行下一個貿易步驟。<sup>3</sup>

平安時代的日本貴族乃至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民眾，都對海外舶來品「唐物」情有獨鐘。史籍中可見日本朝廷在九世紀多次下令禁止海商與民眾的私下交易。比如，《日本三代實錄》仁和元年（885）十月二十日條就曾提到：「大唐商賈人，着大宰府是日下知府司，禁王臣家使及管內吏民私以貴直競買

3 詳情可參見渡邊誠：《平安時代貿易管理制度史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2012 年）。

他物。」<sup>4</sup>同時期的其他法規條文也對這一禁令多有重申：「蕃客賫物私交關者，法有恆科，而此間之人必愛遠物，爭以貿易。宜嚴加禁制，莫令更然。」<sup>5</sup>日本朝廷三令五申地禁止海商與民眾私下交易恰恰反映出當時舶來品的搶手，以及私下貿易的屢禁不止。九世紀時，一位來自中國蘇州一帶的海商，就曾從鴻臚館寫信至京都，想要請托當時駐錫京都寺院的一名中國禪僧義空幫忙物色自己的部分貨物的買家。這位海商為了可以更便捷地獲得在京都銷售貨物的渠道，甚至提前帶自己的侄子來到日本，安排在禪僧義空的身邊做侍童，以建立可靠又牢固的聯繫。但海商的這種請托，本質上即是有悖於政府禁令的一種走私。<sup>6</sup>

不過，在對外來人員的管控這一方面，並非只是

4 《日本三代實錄》卷 48，黑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四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71 年），頁 593。

5 《類聚三代格》卷 18，黑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二十五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年），頁 571—572。

6 詳情可見李怡文：〈九世紀中後期中日間的僧商互動一以《風藻錢言集》與「唐人書簡」為中心〉，《海交史研究》，第 89 卷第 3 期（2022），頁 55—59。

日本特別嚴格。當時的中國，同樣對於來自日本的遣唐使們實施了相當程度的監管。日本天台宗高僧圓仁曾隨公元 838 年的日本遣唐使團入華，並且他對在中國的遊歷見聞都進行了頗為詳細的記錄，他的日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也成為研究唐後期中日交流、佛教史乃至唐代社會的寶貴材料。圓仁當時雖然是遣唐使的成員，不過他並不具備前往唐代都城長安、謁見皇帝的資格，只能留在他們的船隻登陸的長江下游一帶，等着進京的使團成員歸來。雖然如此，圓仁的日記中還是保存了很多從進京成員處聽聞的細節。據圓仁所記，他的遣唐使同伴們在都城長安完成進呈貢品等一系列任務與儀式後，在回到長江下游的路上，想要沿途購買一些在日本十分受歡迎的唐物，諸如香藥、工藝品、書籍等。但他的同伴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隨行官員的嚴格監視。當使團成員僅是稍稍偏離行進的道路，馬上就會有唐朝的隨行官員敲響手中的鼓，提醒他們馬上回歸到隊伍中。而當幾名使團成員在臨近目的地時終於找到機會進入當地的市場，卻在尚未購得想要的商品時就已引起了市場中的管理人員的警惕。當管理人員上前盤查這幾位使團成員時，他

們為了躲避盤查奪路而逃，不僅在逃跑過程中掉落了很多現金，而且有一名同伴仍不幸被扣留。並且，逃回駐地的使團成員還是很快被尋上門來的唐代官員帶走問詢。<sup>7</sup> 圓仁日記中這一番生動的記載將唐王朝對於外國來訪者的管控細緻入微地呈現給讀者，我們也難得地看到了那些管制規定在現實中如何具體實現。

讓我們再將視線聚焦回日本。平安時期的日本朝廷對於外來人員的管控不僅在於對他們入境後活動的限制，另有一項重要的規定被稱為「年紀制」。年紀制對海商來訪日本的頻次進行了規定，要求海商在兩次抵達日本之間必須間隔一定年限。現在學界對於這一具體的間隔年數的討論尚未達成一致，學者們估算的年限從三年到十年以上不等。<sup>8</sup> 這一項規定實際上使得外來人員很難在日本建立牢固的根基。不過，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也時常會有迴旋的餘地，這也促成了以對日貿易為生的中國海商們努力經營與日本當權者

7 圓仁著，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

8 渡邊誠：《平安時代貿易管理制度史の研究》，頁246—265。

的關係，以期在貿易過程中有可能繞過禁令、獲得優待。

在九世紀中期之後，此前曾在中日交往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的遣唐使團已不再出航。前文提及的公元838年入唐的圓仁，實際上就是跟從了最後一批遣唐使。而當外交使團不再出行，如圓仁一般決意去中國求法的日本僧侶們，無法再搭乘遣唐使船，就改為尋求海商的幫助。而這些來自日本知名寺院的僧侶們，不少本就出自日本貴族階層，與日本當權者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中國海商們也藉由護送日本僧侶渡海、為他們送信甚至提供翻譯等機會，建立起了與日本朝臣的聯繫。日本的史料中就記載了不止一位中國海商，利用自己與日本僧侶的關係而繞過年紀制規定。比如，在1005年，海商曾令文攜帶着當時居於中國的求法僧寂照寫給日本實權掌握者藤原道長的信，抵達九州。因為曾令文實際上違反了年紀制的規定，理應被遣返，但藤原道長召集了幾位官員舉行緊急會議，最後以宮中前不久失火、損失了許多唐物為由，特別批准曾令文可以進行此次貿易。曾令文除了呈交來自寂照的信以外，也獻上了茶碗、蘇木、書籍等最

受日本貴族歡迎的唐物給藤原道長，以示謝意。<sup>9</sup>

從九世紀中葉起，隨着日本遣唐使團的中止，主導東亞海域間交流的群體也在發生變化。福岡作為中日交流的最重要節點之一，也見證並參與了這些變化。直到十一世紀早期鴻臚館與大宰府還都在頗為有效地發揮着管控作用，但海商們種種試圖繞過管控的嘗試及其成功，也從側面表明中日雙方對交流的規模與頻次的需求超過規定所限。隨着日本中央朝廷對九州的管治逐漸發生變化，在十一世紀後期，來到福岡的中國海商也開始面對新的機遇與新的挑戰。

## 二、唐房的樣貌

綜合史料中的記載與遺址的考古發掘，可以推知福岡的鴻臚館大概在 1047 年後就已停止使用。日本史料中有兩處提到鴻臚館在 1047 年遭遇了一場大火，而遺址現場也發掘出大量屬於十一世紀上半葉的

瓦片，並且遺址中的焦土層也顯示出鴻臚館在火災後並未重建。<sup>10</sup>

與之相伴的，鴻臚館的管理機構大宰府在同一時期也出現了明顯的功能弱化的趨勢。從十一世紀 70 年代開始，日本的記錄中就開始顯現出大宰府管治不足的種種跡象。如 1085 年，日本朝廷的一次會議上，中央官員就批評大宰府對外來人員過於憐憫，即使見到中央下達的驅逐令也未必會驅逐客商。後來也出現來自宋朝的海商在博多一帶被人搶劫財物，但因為大宰府的主管官員在被京都朝廷任命後並未實際到九州赴任，海商雖然向大宰府報告了遭遇，但沒有及時獲得幫助。<sup>11</sup> 進入到十二世紀後，大宰府對於外商的管控就已不再見於記錄，之前由鴻臚館和大宰府共同搭建起的對來日客商嚴密的管治時代也就此落下帷幕。

而唐房（也作「唐坊」）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現。

9 竹內理三編：《大宰府・太宰府天滿宮史料》（東京：吉川弘文館，1968 年），卷 4，頁 375—376。

10 大庭康時、佐伯弘次、菅波正人、田上勇一郎編：《中世都市・博多を掘る》（福岡市：海鳥社，2008 年），頁 32—33。

11 渡邊誠：《平安時代貿易管理制度史の研究》，頁 359。

之前大宰府對於登陸外商的嚴格管控、連同在鴻臚館居住以及年紀制的要求，都使得外來客商很難在日本建立長期的根基。但鴻臚館的停用與大宰府管理的鬆弛為頻繁往來中日之間的中國商人提供了之前未曾有的、定居日本的機會。大概自十一世紀末開始，就有從宋朝而來的商人開始在鴻臚館東側不遠、御笠川與那珂川中間的博多津建立房屋，這一地帶在十二世紀就形成了「唐房」。唐房實際上在史料中留下的文字記載非常有限，學者們都是根據零散的碎片信息判定唐房的存在。目前可見的「唐房」一詞最早在文獻中的明確出現是在一部抄寫於公元 1116 年的佛經中。這部手抄佛經的末尾標註抄寫者為居住在「筑前國薄多津唐房」的船頭龔三郎。這短短幾個文字恰好可以證明當時「唐房」應該已形成了較為可觀的規模，已是可以作為地址標識的穩定的存在。<sup>12</sup> 另有在中國發現的材料，也可印證此時博多存在一個定居的、中國商人群體。寧波的天一閣博物館保存有三塊刻於南宋

12 榎本涉：〈《宋西入唐緣起》からみた博多〉，《中世都市研究》第 11 輯（東京：新人物往來社，2005 年），頁 91。

乾道三年（1167）四月的石磚，每塊石磚都分別記有一名居住在日本的中國海商，為寧波的一所寺院鋪設道路捐獻了十串銅錢。其中一塊磚的銘文明確指出這位捐資的海商居住在「太宰府的博多津」，而另兩塊磚也寫有「太宰府」與「日本」字樣。根據這三塊石磚相近的形制與刻工，我們基本可以斷定，這三位仍積極參與宋朝的地方建設的海商，都居住在福岡博多唐房。<sup>13</sup>

雖然關於唐房的文字記載十分有限，但福岡當地的考古發現為我們了解當時這一定居在福岡的海商群體提供了豐富的信息。本文開篇提到的、福岡在 1970 年代後期進行的考古勘察，就在數個地點都發掘出了大量的中國產的陶瓷器。這些出土的陶瓷，都位於唐房的區域之內，而學者們也通過分析不同地點出土的陶瓷的不同情況，對各處遺跡的原有功能進行了推斷。在唐房的邊緣、博多津西岸最靠近海的位置，出土了大量的陶瓷碎片，這一處遺跡被認為是用

13 顧文璧、林士民：〈寧波現存日本國太宰府博多津華僑刻石之研究〉，《文物》，1985 年第 7 期，頁 26—31。

於丟棄在航行中破碎的陶瓷的地點。而相對靠近唐房中心區域的一處遺跡，則出土了雖有破損但相對完整的一批陶瓷器，這批陶瓷器還被裝入了長寬各約 1 米、高 30 釐米的木箱中。這一批陶瓷器可能是在商人們已經卸貨之後、在銷售貨品前再次檢查貨品狀態時發現的殘次品。另有一些質量較好的瓷器，在住宅遺構的內部發現，包括燈盞、酒壺、酒杯、杯托、碗碟等，品樣多而數量少，這些可以認為是海商從中國帶到日本自用的日用品，而發現的地點就在他們的家中。<sup>14</sup>

唐房一帶留存的建築架構與部件也可幫助我們推想當時住在那裏的人們的生活狀態。根據對建築遺存的調查，唐房區域內的建築並未呈現出與其他地區建築的明顯差異，可知應該也是日本式的建築。不過在唐房區域出土了許多別緻的瓦當，這是其他區域所未見的。這些瓦當有水波紋式的邊緣以及按押形成的紋樣，形制與中國南方地區——特別是上文提到的海

14 大庭康時：《中世日本最大の貿易都市——博多遺跡群》，頁 21—23。

商捐資修路之地寧波——非常接近。目前尚無確切證據判斷這些瓦當是從中國南方進口而來，還是利用中國的技法在日本製作的。不過考慮到發現的瓦當數目稱不上龐大——學者們推斷這些瓦片的數量不足以覆蓋整個屋頂，而僅是在屋簷起到一定的裝飾作用，那麼似乎更為可能的情況是這些瓦當就是從中國直接進口而來。<sup>15</sup>

唐房中不僅建築物本身是日式建築、中式屋簷這樣的中日合璧，建築物內部的生活器具也是中日混用的狀況。如前文所述，燈盞、碗碟等日用品多為從中國產，而遺跡中發現的煮炊具是石製的鍋，則很可能是日本九州當地所產。在唐房定居的中國海商，大多可能與日本當地女子結婚，這也符合唐房內部中日融合的風格。有一份記錄於 1105 年的由中國泉州出航抵達福岡的船員名單，這艘船所載 72 人，均為男性。可以推知，當時中國女性出海、隨家人到海外定居的情況應十分罕見，而史料中也可見一些定居日本

15 大庭康時：《中世日本最大の貿易都市——博多遺跡群》，頁 26—27。

的中國海商娶日本女子為妻並育有中日混血的後代的例子。<sup>16</sup>

唐房一帶的考古發現對生活在唐房的社群規模以及當時中日之間貿易的組織形式亦提供了豐富的線索。在唐房遺跡出土的陶瓷片，有一部分上帶有「墨書」，即用筆寫在陶瓷製品上的文字。這些墨書通常寫在碗碟等的底部，文字組合一般有如下幾種形式：姓氏、姓氏＋綱、姓氏＋花押等。墨書主要起到的作用是標識貨品的所有者，大概應是在貨品完成包裝，比如一疊碗或碟被仔細捆扎之後，寫在最外側的貨品上。「姓氏＋綱」是常見的墨書組合，如「王綱」、「張綱」。這裏的「綱」是綱首（也稱綱司、綱使）這一稱謂的縮寫。綱首可以理解為一批貨物的實際負責人，這批貨物可能是他們自己的，也可能是受其他人委託經管。一般情況下，一艘海船上會有來自多個綱首的貨物，所以需要標識以區分。至於其他只有姓氏或者姓氏加上某種符號花押的墨書，有學者認



圖一：福岡出土的寫有墨書的陶瓷碎片（感謝福岡市埋藏文化財中心提供本圖像）

16 薛豹、游彪：〈赴日宋朝海商初探——以寧海周氏為中心〉，《浙江學刊》，2012年第4期，頁25—33。



為可能是屬於船員的私人攜帶物品，所以未加「綱」字。<sup>17</sup>不過現有材料似乎也未能提供充足的證據使我們可以進行系統性區分，不同的標識習慣、甚至貨品本身可以提供給墨書的物理空間，都仍有可能影響當時人決定如何做這一標記。

現存的墨書樣本必然只是冰山一角。因為如前所述，從唐房遺跡中挖掘出的陶瓷器或者碎片，絕大多數是已在運輸過程中損壞或者本身是殘次品。這些自然只佔從中國進口而來的陶瓷貨品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都已被出售、進入市場流通，離開了福岡這個港口。不過，僅對從唐房遺跡中出土的墨書瓷片進行不完全統計，我們已經可見至少八十個不同的姓名單字、六十二種不同的名字組合，以及三十五種不同的姓氏與綱首稱謂的組合。一些常見姓氏，如王，出現了超過八十次，另有丁、林、莊等姓氏，也分別出現了六十、三十及二十二次。<sup>18</sup>

17 具體研究可參見大庭康時：《中世日本最大の貿易都市——博多遺跡群》，頁40—41。

18 大庭康時、佐伯弘次、菅波正人、田上勇一郎編：《中世都市・博多を掘る》，頁99。

雖然我們很難用這些碎片信息對當時唐房的居民人數做一個相對準確的推斷，不過保守估計，在十二、三世紀唐房鼎盛時期，應有幾百戶人家居住於此。這些人大多數都以海外貿易為業，而且很多都應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並且也有相當比重的居民信奉佛教。這些海商，雖然真真切切地在這片土地上、這片海域間生活過，但一如歷史上的所有小人物，並未留下多少可以用於復原他們的經歷的痕跡。不過，很幸運的是，有一位曾居住在唐房的大海商，因為結識幾位歷史上的關鍵人物並參與了一些重要事務，在史書中擁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他的一些事跡，經過八百年來的層層加工，現今在福岡如歷史傳說一般被人繼續講述。接下來的一節，我們就會聚焦於這位名為謝國明的大海商，並通過他的經歷管窺當時唐房的生活。

### 三、謝綱首的歷史與傳說

如果漫步在今日的福岡，歷史上的唐房區域仍留存兩處重要的建築，即承天寺與聖福寺。這兩處寺院